

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

——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

李安山

【内容提要】 文章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例探讨了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民族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卢旺达的建国历史中,“想像的共同体”已形成,殖民统治使“种族”身份法律化、政治地位制度化和经济地位标准化,“想像的共同体”成为“制造的共同体”。卢旺达独立后,国家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屠杀成为国家对公民的恐怖行动。全球化促进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大屠杀使卢旺达的民族问题从地区政治、大国因素和联合国 3 个层面与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的互动。

【关键词】 民族;国家权力;国际政治;卢旺达种族灭绝;联合国干预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5)12 - 0007 - 09

在《民族主义与族体政治》发刊词上,威廉·萨福兰(William Safran)提出了有关民族、族体和族体政治的 56 个论点,其中包括政治独立与民族建构的关系、民族与族体的异同、国家建构对民族存在的影响、关于族体意识的产生等,并提出了 28 个需要思考的课题,从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通过个案来解释民族问题、国家权力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做是 10 年后对萨福兰先生的一个回应。

1994 年 4 月 6 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在回国途中的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当晚,总统卫队开始了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在 3 个月内,约 100 万卢旺达人惨遭杀害。卢旺达的民族冲突已过去 11 年,人们对它仍然记忆犹新。学者对卢旺达惨案的反应经历了从愤怒、谴责到冷静后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的悲剧?民族问题何以转化为互相屠杀?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又如何?10 年来,学术界对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历史、思想、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其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外因论”与“内

因论”。“外因论”认为殖民时期的政策是根源,19 世纪 80 年代国际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西方强加的“民主化”进程、军火蔓延和对屠杀计划无动于衷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内因论”则从卢旺达国内因素入手,如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民族的历史积怨,人民

* 本人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骥教授和研究生刘泉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侯颖丽女士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William Safr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pp. 1 - 10.

卢旺达政府的报告提出,共有 1 074 017 人在 1994 年大屠杀中丧生,参见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02.

M. Chossudovsky, "Economic Shock Therapy in Rwanda," *African Agenda*, Vol 1, No 2, 1994, pp. 24 - 26; G.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1959 - 1994*, London: Hurst, 1995, p. 157; Robert I. Rotberg and Thomas G. Weiss, eds., *Massacres to Genocide, The Media, Public Policy, and Humanitarian Crises*, Massachusetts: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96, p. 98. 有的记者也认为西方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参见 Linda Melvern, *A People Betrayed: The Role of the West in Rwanda's Genocid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Wayne Madsen, *Genocide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Africa, 1993 - 1999*,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的屈从心理,国家权力的强化等。笔者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国内民族问题将与国际政治之间产生重要的互动关系。

一 民族:“想像的共同体” 抑或“制造的共同体”

1994年,与西方媒体用“部落战争”形容卢旺达大屠杀一样,中国报刊也多以“部族大仇杀”、“种族仇杀”、“部族大灾难”为标题。对“部族”一词的误用且不论,用“部族”或“种族”来形容大屠杀是否能反映惨案的实质?我们来看看卢旺达的历史与现实。

在定义“民族”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特征均为重要标志。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民族构成,胡图族(占总人口的85%)和图西族(占总人口的14%)。这两个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属于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卢旺达王国建立于16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两个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 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 Ubwiru)。两个民族互相通婚,不断交流。概言之,它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胡图人早于图西人定居卢旺达,图西人何时抵达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图西人在卢旺达国家建立过程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种族差别所致。早期殖民官员建构了一种印象:卢旺达存在两个主要共同体,即从东北部迁来的图西人与属班图人的胡图人。作为种族主义解释非洲文明现象的通则,此观点的理论根据是“含米特理论”。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他们将两者外表差别夸大,用褐色、黑色皮肤,高大、中等身材,优美、粗笨体态来强调图西人与胡图人的体质特征。然而,两个民族的差别并不明显。有的胡图人因具有所谓图西人特征(高个头,高额头,直鼻子)受到迫害,尽管持有胡图人的身份证。一位参加国际会议的尼日利亚学者曾表示,他可以闭上眼睛通过聆听对方对图西人与胡图人是否存在差别的表述来判断其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认为两者无差别的是图西人;声称两者

有差别的是胡图人。这种表述虽有些极端,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两者体质特征并不明显。

有人认为图西人确立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者,拥有牲畜,而胡图人是农耕者;图西人富有,胡图人贫穷。然而,以游牧者与农耕者来划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胡图人早在图西人出现前已拥有牲畜;胡图人与图西人同时占有牲畜和土地的现象确实存在。两个民族的劳动分工并非永恒的、历史发展形成的职业,而是在卢旺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政治权力强加的分工。^⑩有的胡图人富裕程度并不比图西人差,而图西人中也有穷人。一旦富裕或有权势的胡图人威胁到图西人酋长的权力,其家族便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其胡图族身份则被“遗忘”,他们成了

Peter Uvin, "Prejudice, Crisis, and Genocide in Rwand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0, No 2, 1997, pp. 91 - 115; 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7, No 2, 1999, pp. 241 - 86;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a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齐林:《卢旺达:种族仇杀何时休》,载《新世纪》,1994年第9期,第27~29页;才林:《卢旺达部族大灾难》,载《民族》,1994年第11期,第11~14页;李敬臣:《卢旺达:罕见的部族大屠杀》,载《半月谈》,1994年第12期,第62~64页;郭铭:《种族仇杀无休止》,载《瞭望》,1996年第43期,第43~44页。

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219页。

Virginia Morris and Michael P. Schar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Vol 1, p. 48, 1998. 另外还有一个特瓦族(Twa),仅占全国人口约1%。

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 252.

关于含米特理论的经典论述,参见[英]塞利格曼著,费孝通译:《非洲的种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114页。对这一理论批判最有力的是塞内加尔学者安塔·迪奥普。关于中国学者的观点,参见宁骚:《西非古代文明与“含米特假设”》,载《非洲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7~154页;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载《亚非研究》,1994年第4期,第66~86页。

Villia Jefremovas, "Acts of Human Kindness: Tutsi, Hutu and the Genocide,"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3, No 2, 1995, p. 28.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ame Killers*, p. 41; David Newbury, "Understanding Genocid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8, pp. 83 - 88. 两个明显的例证是,独立后很多图西人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重新登记为胡图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难以确定,因为图西人与胡图人的尸体难以从体质特征上区分。

David Lee Schoenbrun, "Cattle Herds and Banana Garden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Great Lakes Region," *African Archaeology Review*, Vol 11, 1993, pp. 39 - 72.

^⑩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ame Killers*, p. 51.

图西人。此过程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即抛弃“胡图族性”)”,指胡图人通过敛财(主要是牛群)来提高社会地位,最后取得图西人的政治身份。相反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人中,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图西人地位而成为胡图人,这一反向社会过程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占有财富资源的统治集团成为了图西人,而非因为图西人才成为统治者。

根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且享有主权”。国家政权的集权化与社会演进过程相同步,图西人和胡图人成为一种政治身份,“想像的共同体”逐步形成。图西人占有统治权,胡图人是被统治者。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认可了这种权力分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这种政治身份制度化。当德国人建立殖民统治时,他们利用已形成的卢旺达国家体制和官僚结构,借助图西人酋长进行统治,而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固了图西人原有的政治身份。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于1933年进行人口统计,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身份。由于缺乏任何标准,殖民当局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头牛标准”,即占有10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10头牛标准”虽十分牵强,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体质特征上难以区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然而,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经济差别:相对富有的图西人和相对贫困的胡图人。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精英,殖民当局将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这样,民族身份(按殖民政府的说法是“部落身份”或“种族身份”)的凝固使“奎胡图拉”和“古普皮拉”的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身份的政治化。

当时酋长职位绝大多数由图西人担任。根据1959年的统计,图西人在45个酋长管辖区中占有43个,其余两个空缺。在559个小酋长辖区里,图西人占有549个,胡图人仅占10个。大部分殖民政府辅助人员也由图西人担任。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1959年的“社会革命”。在殖民统治后期,比利时殖民政策有所改变。殖民政府开始倾向于支持胡图人及其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有学者将这一政策变化归于比利时殖民官员地区身份的改

变。我们认为,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是胡图人独立运动不可阻挡,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将殖民地人民分为“受重用民族”和“受歧视民族”而治之是惯用的殖民统治手段,这在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殖民政府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这一用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采用)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它包括“种族”身份的法律化、政治地位的制度化 and 经济地位的标准化。民族身份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出现,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划分成为殖民制度的有机部分,两者在经济上的区别日益明显。自我“想像的共同体”在这里变成了他人“制造的共同体”。

二 民族、政治与国家 权力的互动

非殖民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卢旺达的非殖民化有其特征,它包括了两个内容: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摆脱图西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可以从1957年的“胡图人宣言”(并非“卢旺达宣言”)表现出来。虽然宣言的立场温和,但它认定胡图人与

[法]勒内·勒马尔尚著,钟槐译:《卢旺达和布隆迪》,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0页。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3, p. 15. 此书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已有中译本。

殖民政府确定身份的根据有三:教堂提供的口头情报、体质特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Mahmood Man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pp. 98 - 99. 有的卢旺达人认为这种标准是一种历史的虚构。

勒马尔尚:《卢旺达与布隆迪》,第223页。

指1959年11月爆发的反对殖民统治和胡图人农民暴动。具体情况可见 Mahmood Man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pp. 103 - 131;勒马尔尚:《卢旺达与布隆迪》,第164~209页。

韩特琼斯(其父为比利时驻卢旺达外交官)认为二战后派驻卢旺达的殖民官员多为比利时的少数民族弗莱明人,他们对胡图人的处境有同感,因而支持“社会革命”。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 254.

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226~235页。

参见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

图西人的冲突是卢旺达问题的核心。占人口 85% 的胡图人的这种反图西人的观点来自于现实体验:图西人酋长在胡图人眼里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帮凶。1959 年的“社会革命”加快了第一目标的实现,也为后来的冲突留下祸根:图西人遭到迫害,一部分逃到邻国,正是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入侵卢旺达的主力。卢旺达于 1960 年取得自治,并于 1962 年独立。

胡图人成为新国家的主导力量。随着胡图族精英登上统治舞台,民族问题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权力有意识地将民族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这是通过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来实现的——在否定殖民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继承了殖民主义“种族”划分的意识形态。从 1959 年开始并持续到独立革命推翻了比利时殖民统治。卢旺达成为主权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胡图人的掌权可以说是从少数人统治转到多数人统治。新政权进行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废除强迫劳动制,土地分配等。然而,在处理民族问题这个重要方面,新政权却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对种族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确立胡图人的统治地位,卢旺达政权承认了殖民政府确定的图西人/胡图人这种二元体制,即卢旺达社会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种族”集团组成。这是对种族主义划分标准的继承。二是在对胡图族/图西族关系的处理上,胡图人集团将政权建立在对图西人的统治之上,这种模式并未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制度,而只是将其倒置过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地位互换。这是对种族主义统治理念的继承。

对国家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统治继承了殖民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而这种压迫正是建立在有效的国家机器之上。国家政权从统治到镇压,再到直接策划、制造、操控大屠杀。第二,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连教堂都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卢旺达的大主教竟然成为执政党的中央委员。第三,培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成为胡图人上层集团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也使政府将图西人作为替罪羊的策略得以实现。对胡图人大众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再由图西人掌握,他们可通过国家权力体会到种族优越感。领导者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统治图西人到屠杀图西人这一演变过程主要通

过理论与实践这两条渠道来完成。

1. 作为权力的意识形态

一个政权必须具备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民认可的价值,政权能对民众进行有效、持久和稳定的统治。政权要确立其合法性,一个重要途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在这里,意识形态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源于三方面:认知体系的定义、价值观的确定与宗教或思想的实践。在卢旺达,意识形态权力的实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理解和定义“图西人”和“胡图人”?如前所述,“图西人”与“胡图人”在前殖民主义时期与殖民主义时期有不同的定义;卢旺达的新政权对两者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殖民统治时期“制造的共同体”概念。

第二,价值观的定位。殖民主义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而“含米特理论”是其理论支柱:与外来的白人相似,图西人也是外来者,他们高人一等。这是殖民主义者为了重用图西人和维护其世袭地位的一种历史虚构。独立后,这种殖民遗产正好成为将图西人赶走的理由:胡图人是卢旺达原住民,是真正的主人;图西人是外来者,应该回到老家去。白人制造的神话成了新政权实施“种族”压迫的理论依据。社会演变与国家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独立后,一些图西人妇女与胡图人男子结婚。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胡西人(Hutsi),指胡图人和图西人通婚产生的后代。然而,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却被用做攻击图西人的证据。胡图人报纸《坎古拉》(Kangura)在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0 年第 6 期发表的“胡图人十诫”将

Mahmood Man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pp. 103 - 116
宣言承认贫穷的图西人和特瓦人的权利,但坚持在身份证上标明族体,以此作为独立后的一种保护措施。

Mahmood Man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p. 232.

马克斯·韦伯将合法统治概括为三种:合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与魅力型统治。[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 238~283 页。

这一观点受到麦凯尔·曼的启发。他提出意识形态权力是从社会学的三个概念中衍生出来,即意思(meaning)、规范(noms)和美学/仪式的实践(aesthetic/ritual practice)。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

约有 1/3 的图西人妇女与胡图人男子结婚。Aryeh Neier, *War Crimes: Brutality, Genocide, Terror, and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 219.

图西人的妻子们比喻为胡图人伊甸园里的“含米特”夏娃,指责图西人利用妇女引诱胡图族精英为奴。十诫要求胡图人与图西人划清界线,不要怜惜图西人;胡图人争取全面解放可得到大湖地区所有胡图人的帮助;任何不同意十诫的胡图人都会被当做内奸。国家的卢旺达电台也竭力传播民族仇恨,1993年,胡图人极端派的“米勒·科林斯解放电台、电视台”开播,它与政府关系密切,在大屠杀前后起了极为重要的宣传和煽动作用。

第三,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在历史上,卢旺达人通过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来表达对神圣王权的敬仰。这种方式也被运用到卢旺达的现实生活。为了加强国家精神和忠诚意识,人们组成各种小团体,通过歌舞形式来颂扬国家、哈比亚利马纳和执政党发展革命运动(1973~1989年间的惟一政党)的成就。比较流行的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激励”(animation)活动,国家工作人员和私营企业职工以脱产方式参加这种文娱活动以表达忠诚。将图西人“妖魔化”是官方广播的惯用手法。1990年,卢旺达电台不断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英科坦尼”(inkotanyi),即在殖民统治时期协助比利时人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地位的图西人民兵组织。这种手法在1994年再次使用,对图西人的攻击愈演愈烈。谣言也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武器。卢旺达电台曾报道:一个总部设在内罗毕的人道主义组织发现了图西人流亡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阴谋杀害胡图人著名政治家并准备对胡图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证据。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一消息与所谓的人道主义组织都是捏造的。

这种“妖魔化”的手法在宣传中不断使用。意识形态宣传有多种意图:以此来加强执政者的合法性,表明政府行动的正义性;增加胡图人的信心,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通过宣传对图西人产生震撼力,使对手从心理上处于劣势。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它具有社会基础。它也反映出执政者的肆无忌惮,对国际社会的干预毫不顾及。

2 作为实践的国家行动

思想或学说通过国家政策转化为物质力量。独立后,新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开始显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1962~1973年),图西人被看做外来“种族”,1963年图西人难民的入侵为政府的歧视政策提供了依据,图西人被迫退出政治领域。总统卡伊班达警告

图西族难民:如果他们还寻求政治权力,“整个图西人种族将被消灭”。胡图人认为卡伊班达政权对图西人在教育、工商、宗教等方面保持优势未进行遏制,政权内部的南北矛盾和贫富悬殊以及一些受过教育者失业,这些危机引发了军事政变,第一共和国于1973年被哈比亚利马纳推翻。1972年邻国布隆迪发生的胡图人大屠杀也是促成政变的因素。第二共和国对图西人的限制政策从政治延伸到公务员领域,政府打着“公正”的幌子,在侵犯图西人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对胡图人的优待。军队的介入为国家带来暂时的稳定。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卢旺达有“非洲的瑞士”之称。然而,20世纪80年代世界市场上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世界金融组织对卢旺达结构调整的不合理要求使各方面矛盾激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带来了新闻自由和多个政党的出现。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

1990年,乌干达的图西人难民已达20万。鉴于卢旺达已向多党制发展,卢旺达爱国阵线(1986年成立)决定向国内进军。虽然卢旺达政府军很快击败了入侵者,但爱国阵线在北部建立了基地。入侵为现政权提供了更好的借口,它不惜以制造假象来动员群众。“图西人威胁”成为动员胡图人的口号。在哈比亚利马纳夫人阿加斯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阿卡祖”(akazu)的小团体,主要由西北部胡图人高级干部和军官组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占据中央和地方绝大部分关键职位。各地先后发生极端派胡

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 265.

Christopher Taylor, "The Cultural Phase of Terror in the Rwanda Genocide of 1994," in Alexander Laban Hinton, ed., *Annihilating Difference: The Anthropology of Genoci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43.

Harry G. West, ed.,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pp. 10 - 11, 129; Aryeh Neier, *War Crimes*, pp. 216 - 217.

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 266.

Peter Uvin, "Prejudice, Crisis, and Genocide in Rwanda," p. 99.
1990年10月4日晚,政府军在基加利导演了一场“开枪进攻”的闹剧,从而在国民中制造一种对潜伏敌人的极度恐惧,并乘机逮捕了近万名图西人。Peter Uvin, "Prejudice, Crisis, and Genocide in Rwanda," pp. 109 - 110.

图人对图西人的清洗惨案。这些是政府策划冲突行动的步步升级,也是1994年大屠杀的预演。

民主化带来的局势变化、爱国阵线的步步进逼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促使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爱国阵线于1993年8月4日签署了《阿鲁沙协议》。这一协议激起了极端派胡图人特别是以阿卡祖为代表的核心集团的极度不满。他们将协议看做是对军队权力集团的致命打击。1993年,布隆迪胡图人总统恩达达耶的当选意味着掌握政权28年之久的图西人统治的结束。然而,这位民选总统4个月后即被图西族军人杀害。这一事件为卢旺达的极端派胡图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成为他们拒绝与图西人合作的理由,也为“图西人威胁”的提法提供了例证,更为大屠杀制造了适宜的气氛,极端主义组织“胡图人权力”应运而生。

除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和国家的直接行动外,国家政权在大屠杀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民族身份的认定。这既是歧视政策的表现,也是大屠杀的依据。通过身份证来辨别民族身份,所有胡图人必须依此对大屠杀做出道德选择。第二,屠杀一旦成为国家行为,则不许任何人提出疑问。在短短100天杀害约百万国家公民,这既需要中央政权的领导,也需要地方政权的效率。第三,在整个大屠杀过程中,现政权的批评者和人权运动者都受到攻击,不论属何族体。国际调查委员会在1993年发现,针对政权反对者的迫害是由总统属下的保安机构领导。屠杀开始后,反对种族清洗的胡图族官员遭到迫害。可以看出,大屠杀并非民族冲突,一切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即执政集团的利益划线。

“国家政权的滥用和国家政权的削弱均可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加强。”卢旺达民族冲突的爆发正是国家权力的滥用所致。这种滥用是就权力的合法性而言,并非无理性的滥用。胡图人领导者穆杰塞拉指出,必须将所有图西人送回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家”。尽管大屠杀的执行人大部分是普通农民,但无论城乡、首都或内地,任务是由“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即县长、乡长和地方议员控制和指导的”。正如一位学者指出:事件的可悲之处在于“它是理性计划的一部分,而非一次非理性事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国家权力的“滥用”。

不可否认,胡图人与图西人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关键在于强调哪一面。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的现实:

两个民族既共生共存又互相对抗。这是与国家权力的运作分不开的。将卢旺达大屠杀说成是一场因历史形成的“种族”或“部落”冲突的延续,这如果不是蓄意掩盖真相,就是无知。这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

三 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主权的建立,这是与西方国家很大的不同点。^⑩然而,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问题,大致分为三类。在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民族问题困扰着国家的团结统一,民族冲

1990年10月在基比里拉,1991年1月在鲁亨盖里,1992年3月在布盖塞拉,1992年8月在基布耶,1992年12月在基塞尼。Guy Martin, "Readings of the Rwanda Genocid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5, No 3, p. 19.

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爱国阵线占有内阁21个席位中的5个,70个过渡性国民议会席位中的11个;爱国阵线将在军队人数中占40%,军官人数中占50%;哈比亚利马纳同意将所有的难民遣返回国,多余的胡图族士兵复员,并许诺在签署协议22个月后进行多党选举。Alison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pp. 123 - 126.

Rue Lemarchand, "Rwanda: The Rationality of Genocide,"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3, No 2, 1995, pp. 8 - 11.

军队参谋长被撤换,反对大屠杀的地方干部或被替代,或被处死,或全家被谋杀。Alison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p. 7.

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9页。

Helen M. 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p. 255.

Aryeh Neier, *War Crimes*, 1998, p. 220.

David Newbury, "Understanding Genocide," p. 96.

胡图人中有的因公开反对或不愿意执行命令而被处决,有的帮助图西人脱离危险,还有的与图西人和特瓦人联合抵抗政府行动。参见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ame Killers*, pp. 220 - 221.

^⑩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 Enloe, "Nation - states and State -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pp. 140 - 158.

突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东欧中欧国家也属此类;有的国家虽以民族凝聚和政治稳定引为自豪,但移民的大量涌入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困惑,亨廷顿在新著中质疑美国的民族认同并对此提出严厉警告;在一些热点地区,由于外国军队的占领引发了新问题,旧的民族矛盾激化,支持或反对外来势力成为冲突的新聚焦点,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这些民族问题都从某个角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有的本身即国际问题,有的从国内影响到国际,有的是某民族本身就遍布世界。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演变为暴力冲突,亦非所有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都需要国际干预。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日益突出。

卢旺达大屠杀如何牵涉到国际政治呢?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这一问题。

层次一,地区政治的角度。

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胡图族、图西族问题是东大湖地区的突出问题。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约有10万~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都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布隆迪政府对胡图人的迫害成为卢旺达政权进行反图西人宣传的最好范例。

第二,难民问题。从卢旺达“社会革命”开始,图西族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大致有三次高潮(分别是1959~1961年,1963~1964年以及1973年)。大部分图西人难民在1959~1964年间逃离卢旺达。1961~1966年间,难民游击队不断从邻国发动袭击,1972~1973年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另一次难民潮。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订协议,前者同意安置3万难民,后者同意再建一个难民营。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已达50万。在乌干达,图西人成为穆塞维尼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数为20世纪60年代的难民及后裔。19世纪60年代与1990年对卢旺达的入侵都是由图西族难民发动的。由于卢旺达政府不容许难民回国以造成资源紧张,它与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第三,非洲国家的互动。一些非洲国家介入了胡图人、图西人的冲突。伊迪·阿明于1972年通过政变上台,他将卢旺达已废黜的国王带到乌干达,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也卷入了两者的冲突。穆塞维尼于1986年通过武装斗争成为乌干达总统,图西人难民大受鼓舞,将原来的组织“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扩大社会基础。1990年,爱国阵线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后,乌干达、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出于对大湖地区安全的考虑,均对卢旺达政府表示支持。在调解过程中,布隆迪、扎伊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积极参与,坦桑尼亚大使在阿鲁沙谈判中贡献良多,尼日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在惨案发生后竭力制止大屠杀。1994年5月底,7个非洲国家出兵1200人听从联合国派遣,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及时行动。

层次二,大国因素的介入。

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的介入。法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特征有两点:保护亲法政权和追求大国地位。它一直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1993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逼进基加利时,它立即派遣伞兵部队以保护卢旺达政权,并力劝哈比亚利马纳与爱国阵线谈判。然而,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

Rita Jalali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7, No 4, 1992 - 1993, pp. 585 - 606.

Ray Taras, ed.,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他认为美国公民的他国身份、亚民族身份和跨国身份正在威胁着美国特性和民族身份。[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民族认同问题同样存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发达国家。

惟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只有犹太人的16%;44%的犹太人住在美国。同样,阿拉伯人至少分布于37个国家,马来人分布于7个以上的国家,库尔德人分布于6个以上的国家。Rita Jalali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 586.

René Lemarchand, "Genocide in the Great Lakes: Which Genocide? Whose Genocid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8, pp. 3 - 16; L'once Ndikumana, "Institutional Failure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Burundi,"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8, pp. 29 - 47.

Catharine Newbury, "Background to Genocide: Rwand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3, No 2, 1995, p. 13.

Charles David Smith, "The Geopolitics of Rwandan Resettlement: Uganda and Tanzani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3, No 2, 1995, p. 54.

Deniel Boumaud, "France in Africa: African Politics and French Foreign Policy,"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3, No 2, 1995, pp. 58 - 62.

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直到6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2500名执行任务的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1/5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

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国的行动。美国是得到卢旺达大屠杀情报最早的国家,却一直不愿意干预并极力阻止联合国进行干预。大屠杀发生后,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的一篇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专稿被美国各大媒体拒绝,最后在1994年4月14日的多伦多《环球邮报》登载。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1948年联合国关于“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对此不感兴趣。1994年5月3日,克林顿签发第25号总统令,对维和行动的范围、人数、期限、资金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参议员西蒙和杰福兹于5月13日与联合国负责卢旺达事务的官员通话讨论卢旺达局势,随后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派兵阻止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克林顿总统竟然在27天后才正式回函,此时大屠杀已近尾声。联合国曾要求美国提供装甲运兵车帮助援卢使团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国可用400万美元租用美国存放在德国的48部运兵车,但须先签约再运输;美国将运兵车送到乌干达机场,再向联合国追加600万美元运费。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出兵干预是害怕索马里事件重演。我们并不想排除这种因素,但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行动,特别是在维和事务上。该国的紧急情况是否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重大影响?它是否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否控制着美国海上运输线的通道?它是否在一个欠稳定地区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卢旺达缺乏可利用之处的战略考虑对解释美国的行动似乎更有说服力,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同年9月19日出兵海地。

层次三,联合国的干预。

很多学者责备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大屠杀没有进行干预。可真如此吗?不对。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国际社会的干预可分为负面与正面两种。凯瑟林·纽伯利在分析卢旺达大屠杀的4个教训中,3个与国际因素有关:军火蔓延、“民主化”的危害、出现类似事件

威胁时国际社会的行动。军火的流入使局势更趋严重:一方面,卢旺达政府大肆购买军火;另一方面,军火在其难民营中蔓延,这不仅加剧了胡图族/图西族冲突,而且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琳达·默文认为,国际社会不仅未能制止大屠杀,它向卢旺达提供的援助资金虽意在帮助其经济,实际上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在种族灭绝的计划过程中,整个国际社会也参与其中。”然而,在调动资源或出兵维和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态度十分消极。

实际上,不论是主权国或联合国,都不愿国际干预发生。换言之,国际干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不可否认,在处理卢旺达危机时,联合国未尽到责任。首先,得到情报后,联合国未采取行动。《阿鲁沙协议》签订后,联合国于1993年10月成立了援卢使团,负责人是达莱尔将军。他于1994年1月11日向联合国报告了胡图族在囤积武器准备大屠杀的情报,要求授权收缴这些武器,但维和部队以超出权限为由拒绝。达莱尔又将情报通告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然而,没有一方采取行动以制止惨案发生。其次,大屠杀开始后,各国使馆忙于撤走侨民。1994年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12号决议,将原驻卢旺达的1500名士兵减少到217名,并授权他们调解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再次,1994年5月17日,安理会通过918

Alison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pp. 17 - 24, 116 - 122.

Guy Martin, "Readings of the Rwanda Genocide," p. 22. 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重型武器和电台,加上没有卡车运送,直到1994年8月,这些运兵车仍停在乌干达的恩特贝。

Alison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p. 623. 也有中国学者持这种看法。参见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36页。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368 - 373页。

Catharine Newbury, "Background to Genocide: Rwanda," pp. 12 - 17.

Guy Martin, "Readings of the Rwanda Genocide," p. 19.

关于卢旺达维和失败已有多项研究。参见Alan J. Kupeman, *The Limit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Genocide in Rwand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Bruce D. Jones, *Peacemaking in Rwanda: The Dynamics of Failure*,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Michael Bamett, *Eye Witness of a Genocid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wand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912 (1994)," in Virginia Morris and Michael P. Scharf, e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8, Vol 2, pp. 238 - 244.

号决议,将援卢使团兵力增至5500人。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这一计划始终未能落实。

可以说,联合国在处理民族冲突问题上存在五大局限。

第一,名称的局限。联合国虽被称为“United Nations”,但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states)联合体,维护各成员国的利益成为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从组织的名称与实质看,联合国存在“亲国家”和“排民族”的倾向。

第二,宪章的局限。《联合国宪章》一方面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其宗旨之一,但它也明确指出:宪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这些约束使联合国在其成员国发生民族冲突时实施干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三,方式的局限。一般认为,联合国在介入民族冲突时有4种方式:维持和平、调解和平、建构和平、避免冲突。实际上还存在一种方式:惩罚暴力,“在有的国家发生的民族冲突中,一方实施的行动明显地违背了人类良知和基本道德,引起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带有鲜明的立场。为谴责和制止种族隔离制而对南非实施的制裁禁运和为声张正义设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属于这种方式。这可以说是联合国介入民族冲突的第五种方式。”联合国在坦桑尼亚设立国际法庭,法官来自多国;比利时、喀麦隆、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已将在自己国家避难的被起诉的大屠杀组织者交给国际法庭。然而,这一法庭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第四,组织结构的局限。联合国组织复杂,事务繁多,各部门有其管辖范围和重点,难以对其他事务发挥作用。卢旺达危机是联合国面对的一种新范式,遏制骚乱成为紧迫任务,既要维和,又要调解;既要军事支持,又要人道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的作用在无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的地区尤显重要,因为大国对这种地区不感兴趣。

第五,资金的局限。维和行动除了需要成员国的良知和共识外,还需要经费(每年维和经费约30亿美元)。经费缺乏使联合国很难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

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

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互换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作为大湖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也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负面干预与正面解决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民族与政治密切相关,民族问题可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族际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移民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20世纪目睹了各种类型的大屠杀,如对原住民的绞杀,对犹太人的灭绝,南京大屠杀,柬埔寨的惨案,波黑的种族清洗。不管行凶者冠之以何种借口,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受害者总是处于弱势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旺达大屠杀不是一个国家的惨剧,也非大湖地区或非洲的悲哀,它是人类的耻辱。

[收稿日期:2005-10-30]

[修回日期:2005-11-06]

[责任编辑:赵远良]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918 (1994),” in Virginia Morris and Michael P. Scharf, e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Vol 2, pp. 247 - 262.

[英]斯蒂芬·瑞安:《民族冲突与联合国》,载《民族译丛》,1992年,第6期,第1~14页。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371-372页。

Aryeh Neier, *War Crimes*, 1998, pp. 220.

Virginia Morris and Michael P. Schar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Vol 1, pp. 117 - 157.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受到美国的阻挠。参见 Linda Melvum, *A People Betrayed*; Wayne Madsen, *Genocide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Africa, 1993 - 1999*. 还可参见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著,张敏、钟天祥等译:《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45页。

Abstract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Shi Yinhong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Genocide in Rwanda

Li Anshan (7)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genocide in Rwanda,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ssue of the nation is in fact an issue of politic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ate power. When Rwanda was established, an "imagined community" was formed. However, the colonization facilitated the legalization of racial identit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conomic position, making the self-imagined community become the other-made community. After independence, Rwanda inherited the colonial legacy of the racist ideology, and the massacre became a terrorist state action toward its citizen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acial issues,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has interacte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ree levels: regional politics, big power games, and the UN platform.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Helsinki Process: Shaping Common Security

Zhu Liqun Li Mingwang (16)

The CSC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which opened in 1975,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Helsinki Process. During its thirty years of history, it has encountered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faced dramatically different security problems. As a process of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CSCE/OSCE (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helped Europe establish the most sophisticated mechanisms in arms control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 After the Cold War, it also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mplementing preventive diplomacy, crisis management,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t should be especially noted that the Helsinki Process has been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such new concepts a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with the above norms and rules.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normative and process elements have been of great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G8

Chen Xiaojin (21)

The past thirty years witnessed an amazing evolution of the G8, including profound changes in its membership, structure, mechanisms,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